

新型智库和决策咨询

——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的启示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 决策咨询部, 北京 100089)

[摘要]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 费孝通是较早探索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关系的学者之一。费孝通认为, 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 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 进行“会诊”, 然后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 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决策咨询。进入 21 世纪以来, 伴随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和平崛起, 科学决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费孝通把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有机结合起来, 并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费孝通的各类著述中, 《小城镇 大问题》是他把自己长期的理论思考与中国实践发展有机结合的典范。

[关键词] 费孝通; 学术研究; 新型智库; 决策咨询

[中图分类号] C 91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5)02-0011-07

引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 费孝通是较早探索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关系的学者之一, 他对这个问题的最早思考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踏上社会研究征程, 这恰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革命时代。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和科学运动唤起了无数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科学和发展等重大问题的重新思考, 探索中华民族的出路成为中国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20 世纪初以来, 一辈辈先贤坚守“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学术信念, 以“学以致用”的治学方法实现着民族复兴的梦想, 其背后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到 20 世纪 30 年代, 这种自我反思由表层深入到内部, 由一般表象深入到内在规律认识, 人们不倦地去寻找中国所特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趋势。学术研究和政策探索成为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流淌的血液, 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活力。

进入 21 世纪以来, 伴随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

和中国的和平崛起, 科学决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和学术理论界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眼下, 各类高等院校、学术机构和政策决策研究机构都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问题。打造世界一流智库正在成为一些研究机构的建设目标。在这个过程中, 有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理论和方法问题亟待突破, 理应提上议程。如果说,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于决策咨询的探索是基于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情关注和自觉探索, 那么 21 世纪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则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学术担当和历史使命。

1979 年, 费孝通受命恢复中国社会学。在恢复社会学初始, 他就提出了建立迈向人民的社会学和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基本构想, 他特别强调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费孝通是一个学者, 也是一个政治家, 他是一位教授, 也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他把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有机结合起来, 并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

[收稿日期] 2014-12-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整体和配套设计研究”(13AZD017)

[作者简介] 丁元竹 (1962—), 男, 山东日照人, 社会学博士,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从事社会发展、公共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

他的各类著述中,《小城镇 大问题》是费孝通把自己长期的理论思考与中国实践发展有机结合的典范。1983年,《小城镇 大问题》的发表,为刚刚恢复的中国社会学赢得了社会的认知,开辟了迈向人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路径,大大拓宽了这门学科的发展空间。

一、决策咨询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并提出对策建议

决策咨询是什么?它与科学研究之间是什么关系?与决策本身又是什么关系?1936年,在《社会研究能有用吗?》一文中,费孝通对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提出“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1](P369)这要求学者、研究者首先要以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事实及其本质规律,为决策提供坚实的事实。进一步说,做好决策咨询工作需要处理好一个重要关系,这就是,要理顺决策咨询和与决策咨询有关的科学事实之间的关系。决策咨询主要是提出对策建议,科学研究主要是发现事实,弄清真相,揭示规律。对策建议是建立在坚实、真相和发展规律认知的基础上的。决策咨询要求决策咨询的主体、决策咨询研究人员,必须掌握相关的事实。这些事实可以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也可以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通过各种途径把握问题的真相和规律,一句话,决策咨询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决策咨询人员需要和科研人员一样,坚持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不带有任何倾向性,首先把事实搞清楚,把握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和真实面目。通常,决策咨询工作者可以根据大量不同学科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把握事实真相,因此,决策咨询带有宏观性、综合性和高度概括性。综合性和高度概括性并不排除决策咨询工作者对于某一问题和事实进行深入分析和实地研究。概括性和宏观性的研究往往会停留于表面,而实地研究可以使决策咨询工作者找到解决问题的感觉。决策咨询就是要在了解这个真实世界的基础上按照人们的意志去改变这个世界,告诉人们怎样去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通常,优秀的决策咨询是带着问题和理论去认识并告诉人们这个真实世界的。尽管决策咨询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带有概括性和宏观性,但是,新型智库建设要求决策咨询工作者必须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底,必须对

现行政策有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对现实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只有具备这些素质和素养,决策咨询者才能敏锐地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发展趋势,在大量研究成果中发现决策所需要的事实支撑。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要求新型智库向高端性和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原因。^[2]1984年,胡耀邦在谈到费孝通的《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时说,费孝通是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恐怕也就是这个意思。^[3]

决策咨询要求的科学研究必须全面深刻,不可以偏概全,尤其是要处理好学科研究与全面研究和分析的关系。这就要求专门的学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各个领域具体问题的厘清上,尤其是从自己的专业眼光和视角提出对问题的深刻分析。决策咨询则是对各个学科基础上的知识进行综合和分析。相对于各个专业学科,决策咨询更具有综合性特征,需要决策咨询人员拥有综合素质和综合分析能力。这一点,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问题研究中就看得非常清楚,对我们在当前理解学科建设与决策咨询的关系仍有重要意义。费孝通谈到,“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的片面性,每一门学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大。”^[4](PP. 16—17)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决策者越来越需要建立在实地研究和大数据基础上的决策咨询支持系统的帮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对决策咨询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思考,这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前提条件。检验决策咨询成果的根本标准是看它们是否能够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拿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并能引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尤其使政策不仅有现实性,更有前瞻性,不至于为下一代人带来决策障碍和发展难题。这应当是相当高水平的决策咨询和决策。

针对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在研究和探索中进行理论解释、历史分析、实地验证。通过理论分析来寻求问题的本质解释,通过历史分析来解释同一问题在其他国家是如何解决的,以求得启发;通过实地研究寻求现实中问题的答案。把这些要素结合起来,就是决策咨询。在对苏南小城镇的调研过程中,费孝通发现,“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4](P17)30多年前,也就是1983年底,费孝通教授

基于对包括当时吴江县（现苏州市吴江区）在内的苏南小城镇的深入调查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小城镇 大问题》这一“脍炙人口”的佳作，提出了“小城镇 大问题”这一寓意深长的论断和发展“星罗棋布”小城镇的战略构想。1984年初，《小城镇 大问题》首次在《瞭望》杂志上发表便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经济学家王于描述道，“1984年上半年，小城镇问题一时成为农村改革领域内的热门问题，其中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便是费孝通教授的著名文章‘小城镇、大问题’”^[5]（P37）。费孝通提出了一个历史命题。当前，从人类正在体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习习微风中，人们可以品味“小城镇 大问题”的时代含义。毫无疑问，30多年过去了，“小城镇”依然是中国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战略构想则由于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赋予其新的涵义。

在现代决策体系中，决策咨询是决策和科研之间的中间环节。费孝通对于小城镇的分析就是建立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小城镇问题之“大”大在它触及到了中国人多地少这个根本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费孝通在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在对苏南、苏北等地的小城镇进行“卷地毯”式的调查基础上，陆续写出了《小城镇 再探索》、《及早注意小城镇的环境问题》、《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小城镇——苏北初探》以及《小城镇新开拓》等著述，逐步明晰了小城镇的发展脉络和趋势。费孝通预见道，“到2000年，估计至少要增加二亿人口，如果维持原来两头大的葫芦型，势必发生城乡两僵的局面。所以要下活人口这盘棋，必须做两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为城乡之间的人口蓄水库；一是缩短地域间的差距，加强人口流动，化密为稀。”^[4]（P93）1984年，我国的人口是103008万人，到2000年底是125786万人，实际增加与费孝通的估计相差不大，多出22778万人。正如费孝通说道的，“苏南地区的历史传统可以概括为人多地少。”^[4]（P33）在此情况下，农民要富裕起来，必须依靠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其他产业要发展，必须具备产品能够交换和加工的经济中心。乡镇工业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也来自农民增加收入的需求。抓住人口众多这个牛鼻子来考量小城镇的发展，考量小城镇在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至少有这么几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小城镇问题之大是因

为它触及了中国这个世界人口大国的人力资源布局、劳动力就业、农民致富、城市化模式、产业格局、区域间协调发展、生态环境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也都会在小城镇的发展和建设中或多或少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从“七五”时期开始，我国的小城镇增长速度前高后低，镇的增长速度在“七五”时期为5.7%，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对于“小城镇”问题的重视，“八五”时期达到7.7%，“九五”时期逐步放缓，在“十五”和“十一五”时期均为负增长，“十二五”前期为1.2%；乡的建制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与乡级建制同时下降的还有村民委员会。

小城镇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涉及诸多学科，研究小城镇就需要多学科之间的合作与协同。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在对小城镇问题的研究中就吸收了诸多领域的专家参与，包括当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的专家参与，从全景角度俯视这个问题。他开启了多学科之间合作和协同来推进决策咨询的先河，为决策咨询和科学研究提供了范例。这也造成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诸多误解和非议。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历史，创新确实需要勇气和胆识。

二、政策制定是在实践中检验 并在实践中提出新问题

从决策咨询到决策执行是一个系列的、联系的过程。现代决策中“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客观事物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又给研究部门提出了新课题，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进行。实践、科研、咨询和决策四个环节的循环往复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4]（P17）费孝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经过江村调查、云南调查以及后来数访江村和对于小城镇的“卷地毯式”的调查，不断发现小城镇发展中的问题，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思考。实践在不断发展，费孝通的研究和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他的有关小城镇的思考和建议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费孝通关于小城镇的思想源于吴江，随着吴江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实践的过程是这样：当前，吴江小城镇发展又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它对有关决策咨询提出了新的课题。学习和研究费孝

通的学术思想，就是要不断研究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探索新形势下的新情况。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吴江的产业集群初步建成。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成为国家背光板生产基地和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七都镇成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缆产业基地和中国光缆之都。以丝绸生产著名的盛泽镇发展成国家丝绸星火技术密集区、吴江高新区、中国丝绸纺织名镇、中国四大绸都之一。七都镇 2003 年由原来的七都镇和庙港镇合并而成，费孝通开展农村研究的著名“江村”——开弦弓村就隶属于原庙港镇。庙港镇同时设立街道办事处，辖区约 103 平方公里，其中镇区面积约 6 平方公里，全镇约 8.8 万人口。1982 年，盛泽镇也是当时吴江县人口最多、产值最高的小城镇，当时，盛泽出口的丝绸就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1/10，具有产业中心和专业中心的特点。盛泽的绸庄把众多分散的农村的织机和织户联系起来，形成以工业产品为中心的经济中心。当时，“盛泽与震泽不同在于它主要不是商品流通，而是作为家庭工业的中心。”^[4]（P2）这个镇“附近的农村里，就有很多缫丝。吴江县松陵镇等靠太湖的地区以养蚕为主，养了蚕后，缫了丝运到盛泽去织，所以盛泽是……‘日出万匹，衣被天下’”。^[4]（P5）太湖新城，又名横扇社区，是中国毛衫名镇和缝纫机之乡。历史上“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是一个商品流通的中转站。”^[4]（P20）费孝通观察到，作为集散中心的震泽镇通过航运把周围的区域与农村联系在一起。这个商品集散中心已经成为中国亚麻绢纺名镇和中国蚕丝被之乡。而且，震泽古镇还是国家著名的旅游区。在《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中，震泽被称为第一种类型的小城镇，费孝通将盛泽镇称为小城镇研究的第二种类型。桃源镇是中国服装名镇。被费孝通称之为第四种类型的是同里镇，现在也叫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它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十大魅力名镇。历史上的同里镇是一个消费享乐型城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被改造成水乡景色的旅游城镇。吴江的这些乡镇和乡镇企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传统特征的四个产业集群：光电缆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丝绸纺织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包括输变电设备、汽车配件、环保装备、缝纫机、电梯、纺机等六个产业）。笔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随费孝通访问这些乡镇时，它们基本上还都是在独立作战。眼下，适应产业布局的要求，这四个传统产业集群

相对集中布局，形成“四大片区”，占吴江区工业经济总量 85% 左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吴江经济是“坚守传统”，不割断历史。与此同时，吴江还通过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引导形成四个新兴产业集群，包括食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吴江的现代服务业也逐步成型。可以说，吴江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坚守传统，锐意创新”。所谓“坚守传统”，就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镇一品”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产业集群，形成规模优势和竞争力，提高聚集效率。吴江的传统产业集群不仅在国内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在国际上也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如纺织业、光电缆业、电梯业等等。这些新发展，对下一步小城镇发展乃至整个城镇化进程提出了新问题，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就成为眼下吴江发展的新课题，推动决策咨询进入新阶段。如费孝通当年所说，政策必须进入实践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新的启示，提出新的课题。费孝通不仅是一个实践的追随者和记录者，更是一个智者。

当前，小城镇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2014 年 3 月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要求，增加中小城市数量，提高小城镇服务功能，按控制数量、节约用地、体现特色等要求，实现小城镇发展与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相结合、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与服务“三农”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目标。在《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的 31 年间，作为费孝通教授思想原点的吴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把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保障“五个一体化”摆在重要位置，加快推进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实现城乡间的互动发展，在实现吴江加快城乡软硬件设施均衡发展的同时，让城乡居民在政治、文化、经济上差距缩小、趋于一致，在城镇化建设上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成就，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子。电子信息、丝绸纺织成为吴江的两个主导产业，产值达到千亿能级。在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大批地摊型企业企业在吴江脱颖而出，恒力集团和盛虹集团就是显例。到 2014 年底，恒力集团和盛虹集团目标销售分别在 1700 亿元和 1000 亿元以上，正在跻身世界 500 强行列。2014 年 10 月，笔者在当地访问期间，区里的领导一再讲，他们已经不再把 GDP 放在重要位置，2013 年，吴江新兴产业产值还是达到

1508.6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48.9%。两大千亿级产业，电子信息、丝绸纺织运行平稳。恒力集团榜居年度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 500 强之首。吴江光电缆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亨通、永鼎、通鼎 3 家企业列入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作为新兴产业的服务业，与其他产业比较，比重不断提高，2013 年的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603.47 亿元，同比增长 11.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2.6%。这些发展，包括产业升级、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远远超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想象。市场机制一旦建立，它释放出来的活力就会超出人们的预期。对于这种超出预期的发展，人们自然要纳入决策视野。当然，也还需要看到，一些客观的因素，诸如村民居住分散、村级集体经济比较薄弱、被撤并老镇区功能弱化、“集”的进程慢、村落房屋风貌凌乱，等等，或多或少影响了吴江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也对吴江今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这些问题，要求下一步的决策必须考量。费孝通对于小城镇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了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又在新的实践中提出更新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断积淀的过程，也是决策咨询的基本规律，吴江当前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如何在费孝通长达近一个世纪研究的基础上来探索吴江乃至中国的城镇化，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吴江城发展深深打上了费孝通的烙印，吴江也是一部鲜活的城镇发展历史。

三、中国特色的决策咨询要研究 可以生长出新东西的旧事物

费孝通强调，“要真正懂得中国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研究可以生长出新东西的旧事物，甚至要用旧形式来发展新事物，最终使旧的转化为新的。”^[4]（P42）懂得中国的特点就是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点，正如费孝通一直强调的，那就是人多地少。要下活人口这盘棋，一是要发展小城镇，二是要开发西部。在发展小城镇问题上，他建议把“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离土”两种方式作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来开展研究。当前，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赋予这两条道路一新的内涵。31 年前，费孝通已经看到，“工业规模越大，越能趋向合理化，这是别国的经验。我们不该不假思索地把它硬搬过

来。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怎样在发展工业中解决广大农村中居民的生活问题，而不应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农村破产的老路。”^[4]（P41）他这里讲的工业规模是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机器大生产和规模化经营。在此基础上产生劳动力的集中、人口的集中、生活方式的集中，这就是城镇化。针对中国特有的问题，费孝通主张，中国不要简单重复发达国家的道路和简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在自己的发展中始终要以人民的生活为中心，这也是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中的基本思想。费孝通强调，决策咨询不仅要把学科之间的认识综合起来，还要把现实发展中的各种要素有机联系起来。把城和乡有机结合起来始终是费孝通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变迁中都市和乡村至少同样重要。”^[1]（P110）“所谓都市和乡村就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人口分布的两种形式罢了。”^[1]（P114）“星罗棋布”，是费孝通教授基于当时苏南乃至中国农村“人多地少”这一区情和国情提出的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思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由于乡镇企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星罗棋布”这一构想曾一度受到人们的质疑，主要来自“不效益”和“环境污染”，有悖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确，在那个时代，传统制造业遍布苏南，像在《小城镇大问题》中描述的盛泽镇，就是“一个丝织工业的中心，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镇。”^[4]（P21）这个时期的工业，以机器大工业为核心，属于时下人们议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产业聚集和城镇规模集中为其内在属性，这也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中，尤其是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特点。时至今日，盛泽全镇户籍人口已达到 13.2 万、外来人口约 27 万，是国家重要的丝绸化纤纺织品生产、交易和出口基地。丝绸纺织业占盛泽全镇工业经济总量的 90% 以上，其中资产超过 20 亿元的企业有 4 家。当时，费孝通教授还注意到了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谈到震泽时，他说到，“七十年代以来，工业发展起来，经济确是繁荣了，可是生态环境却变坏了。”^[4]（P86）作为力主发展小城镇问题的学者，费孝通并没有掩饰这个新生事物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 1984 年的第二届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费孝通就呼吁，“不要忽视小城镇的环境问题。”^[4]（P90）

费孝通关注家乡吴江的发展，积极从中寻找

“可以生长出新东西的旧事物”。近年来，面对国际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吴江发现，依然坚持工业化数量的扩张带动城镇化，大搞工业园区、搞产城融合，无论从资源供给还是从生态容量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乘借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东风，紧紧抓住新一轮的产业革命的机遇，吴江把“城”与“乡”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始终把人的发展摆在首位，从保障城乡居民平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出发，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

费孝通基于中国文化、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是深远的。吴江立足于传统产业和城镇布局，发展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形成了新的产业格局和城镇布局。从国际和国内大势来看，眼下，吴江正在通过产业的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在“星罗棋布”小城镇战略构想上进行创新和探索。正如费孝通 1984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说道的，“我国的工业化并不是把农民赶到城市里去受现代化的洗礼，以致在社会生活方面出现差距相当大的城乡差别。我们是把工业送到农村，或送到离村里很近的镇上，把生活各方面的现代化也送进了农民的家里。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4]（P95）费孝通提出这个思想的时候，整个世界还是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期，费孝通还没有把他的农村现代化思想与新技术革命具体联系起来，并加以细化，但是他看到了发展的大势。当前，设计这样的现代化思路正当时。2014 年 6 月 9 日，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重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思路，值得当前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全面体会，深刻认识，牢牢把握。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6]的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小反响。《经济学人》评论道，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里夫金把 21 世纪的两种新技术——互联网和再生能源结合起来，探索人类未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经济将成为创新型经济的主要形态和实施创新驱动与新战略的重要载体。地处长江经济带的吴江区，可以通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打破产业发展瓶颈，率先实现转型升级，引领国家科技经济，占领发展至高点。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 3D 打印技术，这种新型铸造技术可以满足个性

化需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标准化机器大生产形成鲜明的对照。人工智能将代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也代表了计算机科学发展的未来，蕴含着国家产业变革和升级的重大机遇。3D 打印技术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还将大大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也必将带来人口布局的革命，在这点上，吴江已经并正在进行探索与创新。吴江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正好可以通过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来加以解决。创新意识、互联网思维是新时期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本文中我们一再讲，费孝通教授当年提出的“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构想也将在吴江的实践探索中进一步完善并赋予时代内涵。吴江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走出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城镇格局。也要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还是沿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思维方式设计沿江经济发展、布局沿江经济，这势必带来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最终危及长江。从时代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看，长江经济带的设计和发展趋势必将是新技术和新型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型城镇化。要把人联网和物联网作为振兴经济的新兴产业。2013 年，中国物联网盈利近 80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对于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中国有其后发优势。以物联网和人联网为基础，重新布局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城镇化格局，将是长江经济带建设担负的历史使命。必须时刻记住，当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各种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产生工业革命以来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和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运转形态。它同样也为费孝通当年提出“星罗棋布”的小城镇的构想奠定了技术基础。

结语

笔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经有幸多次跟随费孝通到各地调研。在外地调研中经常听他对当地干部说的一句话就是，地方在实践中创造了很多的经验，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科学研究必须紧紧追赶实践的发展。每次调研，他都能够从当地实践中挖掘出不少新的思路，以他独特的眼光发现新问题，预测新趋势，写出脍炙人口的文章。比较早年的研究，费孝通后期的研究更具有决策咨询的特质，他紧紧围绕地方发展的实践，置身于与地方干部群众的共同讨论中，并加以综合分析，以期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费孝通对于中国小城镇的研究更

多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对事件的总结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乃至全球发展趋势。

“学以致用”是费孝通治学的基本宗旨，也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初衷。20世纪30年代，他之所以从东吴大学医学系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因为他发现医学仅仅可以治愈个体身上的疾病，而社会学可以从社会入手医治社会问题，根治社会疾病。从此也就开启了他探索中国发展及其出路的长达75年的研究历程。费孝通始终如一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探索城乡发展问题，他始终坚持认为，中国社会自有其独特性。在中国国情的意境下，进行创新和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费孝通倾其毕生精力的追求，“行行重行行”就是其学术思想的生动写照。

当前，一场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变革正在和已经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一个以

网络为基础的动态社会把人类的活动联系起来，它甚至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人们预定的种种假设，在这样的技术环境中重新考虑小城镇问题和中国的人口布局就显得更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人们需要围绕着新技术革命来形成新的认同，形成以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3D打印之名而建立起来的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将预示着大机器和标准化生产的工业时代的终结和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在审视费孝通对于小城镇的持续探索以及当前与之有关的一系列重要议题之后，探索以新型智库建设为核心的决策咨询问题并使决策咨询紧扣中国特色加以展开就显得特别迫切。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任和使命。与老一辈学者相比，新时代的学者们应有更大的历史担当和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胜任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变革。

[参考文献]

- | | |
|---|--|
| [1]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一卷）[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4] 费孝通. 论小城镇及其他 [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
| [2] 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 [N]. 人民日报，2014-10-27. | [5] 王于. 大转变时期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
| [3] 费孝通. 小城镇四记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 [6] 杰里米·里夫金. 第三次工业革命 [M]. 张体伟，孙豫宁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

New Type of Think Tanks and Consultation of Decision Making

DING Yuan-zhu

(Department of Policy-making Consult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89, PRC)

[Abstract] In th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Dr. Fei Xiaotong is one of the few scholars who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 According to Dr. Fei, in order to avoid the one-sidedness of decision-making, there should be an intermediate link between policy and research, which tries to integrat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disciplines though consultation. After this process, we can provide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to the decision making depart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of Chines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new think tank had called for the strengthening and building up a sound decision-making advisory system. Dr. Fei achieved fruitful exploration through combin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cy advice. Among his works, Small Towns, Big Problems is a classic in which Dr. Fei combined his thoughtful long-term theories with the Chinese practice development.

[Key words] Fei Xiaotong; decision making; new type of think tanks; consultation of decision making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